

珞珈史学文库
LUOJIA SHIXUE WENKU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 与德意志知识界

李工真 著

DEYIZHI XIANDAIHUA JINCHENG
YU DEYIZHI ZHISHIJIE

商务印书馆

“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成果
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资助出版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李工真 著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李工真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珞珈史学文库)
ISBN 978-7-100-07358-5

I. ①德… II. ①李… III. ①现代化—研究—德国 ②
知识分子—研究—德国 IV. ①D751.62 ②D751.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81300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与德意志知识界

李工真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358-5

2010年1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7³/₄

定价: 48.00元

总 序

“珞珈史学文库”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师学术研究成果的汇集。第一批推出的是二十多位教授的文集。以后将根据情况，陆续推出新的集子。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历史。早在 1913 年，武汉大学的前身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就设置历史地理部。1930 年武汉大学组建史学系，1953 年改名历史学系，2003 年组建历史学院。一批又一批著名学者，如李汉俊、李剑农、雷海宗、罗家伦、钱穆、吴其昌、徐中舒、陈祖源、周谱冲、郭斌佳、杨人梗、梁园东、方壮猷、谭戒甫、唐长孺、吴于廑、吴廷璆、姚薇元、彭雨新、石泉等，曾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推动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和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繁荣的同时，在武汉大学和中国史学史上也留下了嘉名。其中，唐长孺、吴于廑两位大师贡献最为卓殊。

改革开放 30 年间，武汉大学历史学科建设成效显著。1981 年，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获得全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权。1987 年，历史地理学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1988 年，中国古代史被列为国家重点学科。1995 年，历史系被批准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1997 年，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1999 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1 年，中国古代史再次被列为国

家重点学科。2007年，中国古代史第三次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新增为国家重点学科。2008年，历史学一级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2001年，以中国古代史为核心的国家“211工程”二期建设项目“中国文明进程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启动。2008年，分别以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为中心的“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新资料整理与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研究”与“世界历史整体发展中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研究”启动。目前，历史学院设有历史学、世界历史、考古学三个本科专业；史学理论及史学史、考古学及博物馆学、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国际关系与中外关系史和地区国别史等12个二级学科。在研究机构方面，设有中国3至9世纪研究所、世界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15至18世纪世界史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世界研究所，以及简帛研究中心、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经过后继者的持续努力，逐步形成了严谨的学风和优良的教风，确立了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断代史与专门史、地区史与国别史相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学术特色，成为武汉大学在海内外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之一。

历史学院的老师，在辛勤教书育人的同时，也为科学研究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各自从事的方向或领域，推陈出新，开拓前行，撰写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和论文。学院决定编撰教师个人的学术文集，是希望各位老师把自己散见于海内外各种出版物上的代表性论文加以整合。这样，通过一种文集，可以约略体现教师本人的研究历程和领域；而于整体方面，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武汉大学历史学的学科格局和学术风格。

每本文集的选篇和修订，由作者各自负责。学院教授委员会对

入选文集进行遴选，并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

“珞珈史学文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的支持，得到了武汉大学“基础学科振兴行动计划”的支持，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各位领导和相关编辑先生的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0年2月

目录 Contents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研究

-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3
- 德国现代化进程与威廉时代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24
- 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反犹主义 37
- 德意志“福利国家化”政策的起源及意义 56
- 德国魏玛时代“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与危机 73
-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德国反犹主义 88
- 德意志中间等级与纳粹主义 105
- 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纳粹主义 126
- 德意志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居（1933—1941） 141
- 社会市场经济的理论来源 171

德意志知识界研究

- “柏林大学模式”及其发展 191
- 哥廷根大学的历史考察 211

| | |
|-------------------------------------|-----|
| “美国主义”与文化批评 ——魏玛德国文化批评运动浅析 | 236 |
| 纳粹经济纲领与德意志“经济改革派” | 255 |
| 德意志“历史学派”传统与纳粹主义 | 282 |
| 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 | 306 |
| 阿尔文·约翰逊与“流亡大学”的创办 | 351 |
|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 | 378 |
| | |
| 作者主要著述列表 | 427 |
| 后 记 | 432 |

德意志现代化进程研究

普鲁士的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作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在欧洲各国造成的政治影响是不一样的。法国的启蒙运动为一场“自下而上”的市民革命准备了思想前提；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并没有产生这样的结果，而是为一场“自上而下”的大改革准备了思想条件，并长远地影响到一条“德意志特殊道路”的发展。

这种比较与反思对于加强历史性问题的意识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使得分析德意志，尤其是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特点显得越来越重要了。那么，普鲁士能成为整个德意志启蒙运动中心的历史背景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启蒙思想家来源于哪些社会阵营？又在哪些社会阶层身上找到了回声？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目标？运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又是如何组织起来的？腓特烈大帝是如何请教启蒙思想家的？普鲁士的改革政策与启蒙运动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问题都关系到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本质特点。因此，在研究19世纪以后的德意志现代化特殊发展道路以前，事先澄清这些问题非常必要。

一、普鲁士“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

18 世纪初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其政治版图是分裂化的。300 多个大小邦国、宗教诸侯领地、帝国城市、独立城市在各自为政，并维护着对各地邦君或统治者的忠诚。这种政治分裂化给德意志的启蒙运动带来了三个严重后果：

首先，与英国、法国、瑞典、俄国等这些周边邻居们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化相反，这个“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经历的恰恰是一场中央权力的瓦解过程。早期近代中央集权式主权国家的形成只发生在邦国地方性区域空间，而不发生在全帝国领域。因此，当启蒙运动从荷兰、英国兴起，继而在法国形成中心并向欧洲各国广泛传播时，德意志的启蒙运动要想发展成一场影响遍及全帝国的民族性运动十分困难。

其次，自宗教改革以来，教派的分裂像“乘数”一样加剧了已有的分裂，这使得德意志各邦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政治观念、行动、经历上都彼此不同。加之，德意志缺乏像巴黎、伦敦那种在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首都，这就进一步加剧了它整个启蒙运动联络上的困难。因此，在德意志空间里，要想兴起一场方向一致的启蒙运动，需要各地的启蒙思想家跨越很远的思想距离才有可能。

其三，极为不同的政治—社会结构存在于德意志各邦国、宗教诸侯领地、帝国城市、汉萨城市、伯爵领地之中，这种多样化与区别化导致了德意志社会结构严重的非匀质性，并涉及一个具有非匀质性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与其他西欧国家作为“第三等级”的市民阶层不同的是，在德意志的“第三等级”内部，既有 18 世纪中人们通常谈论的“自由帝国城市”那样的“老城市共和国”中的市民阶层，也有社会状况、心理状态、政治观念上完全不同的“汉

萨城市”中的市民阶层，更有与前两者都不相同的诸侯国都城中的市民阶层。^①从整体上讲，这个具有非匀质性的“第三等级”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与工业化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作为民族统一体的成长方面，都比西欧各国中那些具有匀质性的“第三等级”要落后得多。他们被各不相同的城市法令、行会法规捆扎在这个等级制社会里，而他们在社会能动性与社会行为准则上各具特色的区别，来源于不同经济领域——手工业或贸易——的所属性。这种区别使他们难以对启蒙时代的德意志发挥整体一致性的正面影响。

这就导致了一种对德意志历史发展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局面：对德意志空间来说，恰恰是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新教邦国里，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为发达、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邦国里，一个新阶层——“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Bildungsbürgertum）——的形成，才对启蒙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平民出身而又受雇于国家的公职人员、学者、作家以及出版商是属于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并以特殊的方式区别于各种形式中的老市民阶层。尽管他们在传统的等级社会结构中没有明确固定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正是他们的动力与能动性，才突破了等级制秩序凝固、静止的状态。^②首先，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如在金融业、纺织加工制造业领域中，专制主义的国家需要这个新阶层来发挥他们具有开创性的积极性，从而将重商主义政策推向前进。^③但更为重要的是，普鲁士专制主义国家要想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体制和纳税体制，必须依靠这个日益成长起来的新阶层。而这个新阶

① Horst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 Berlin: Severin und Siedler Verlag, 1974, S. 268.

② Hans Gerth, *Bürgerliche Intelligenz um 1800. Zur Soziologie des deutschen Frühliberalismu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6, S. 34.

③ Jersch Wenzel, *Juden und, Franzosen 'in der Wirtschaft des Raumes Berlin-Brandenburg*, Berlin: Colloquium Verlag, 1978, S. 57.

层的成长一方面与专制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直接关联之中，另一方面，这种专制主义的发展也为这些平民子弟提供了有限的上升机会。从更长远的政治前景来看，这个专制主义国家也只有借助这个新阶层的帮助，才能插手地方管理，并通过中央管理，从普鲁士邦国议会手中剥夺那些享有等级特权的乡村容克贵族手中的权力。因此，不是那些“占有财产的市民阶层”，而是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成为普鲁士—德意志的现代化因素。

这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与普鲁士官僚机构的结合是一个漫长的进程，这个进程尽管并不源于启蒙运动，但它与普鲁士启蒙运动的意图是相一致的：“使统治理性化、反对等级制、提高社会能动性。”^①它服务于一场局部性的现代化，这场现代化的目的在于：增长人口、提高经济效益、增加税收，以达到服务于整个国家的一体化、确保已占有的版图并扩充版图的军事、外交目标。

这场局部性的现代化导致了一种对传统社会结构与法律结构的长期侵蚀，它使普鲁士的启蒙运动在政治与社会领域里与开明专制主义目标同走了一段路之后，终于成为开明专制主义“一体化”进程中的产物。

二、对普鲁士启蒙运动载体的社会学分析

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社会载体究竟来自哪些职业阶层呢？当时最重要的启蒙杂志——《柏林月刊》（*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撰

^① Karl Malettik, *Jahrbuch für die Geschichte Mittel und Ostdeutschland*, Berlin: Springer-Verlag, 1977, S. 86.

稿人的社会出身，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在这 300 名撰稿人中，80 名学者组成了最大的集团，占有 27% 的份额，他们是大学与人文中学的教授及各级教师；60 名国家官员组成第二集团，占有 20% 的份额；50 名神学家、教士、牧师等神职人员组成第三集团，其份额也占近 17%；另有 45 人出身于贵族或上层贵族并构成第四集团，这个 15% 的比率超过贵族在总人口中比率的数倍；剩下的 20%，由来自其他各社会职业阶层的近 60 人组成，其中包括 15 名“自由职业作家”、10 名军官、7 名书商和银行家在内。^①

从《柏林月刊》撰稿人的出身来源上讲，占压倒优势的是来自“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其次是神职人员与“受过教育的贵族圈子”。这些人都与普鲁士国家有着强烈的物质上的联系，都属于国家与社会中有影响地位的阶层，而来自手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成员在启蒙思想积极宣传者的行列中极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 300 名撰稿人中，一半人有自己的主业，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写作、教育、科学工作的。另外，撰稿人中有 10 名犹太人、5 名出身于贵族阶层的妇女，这两者尽管数量很少，但由于他们过去是完全被排除在这类活动之外的，因而仍然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

《柏林月刊》作者群的这种社会学面貌，典型地反映了普鲁士启蒙运动载体阶层的基本结构。例如，与著名启蒙思想家弗里德里希·尼科莱（Friedrich Nicolai）主编的《德意志图书馆汇编》（*Allgemeiner Deutscher Bibliothek*）杂志进行合作的作者共有 433 名，对他们进行的一份社会学分析与研究，证明了与《柏林月刊》类似的社会组合。又如，尼科莱曾于 1781 年组织过一次与启蒙运动相关的穿越德国与瑞士的旅游，其后，他公布过一份参加这次旅游的近 800 人的名单，

① Horst Mö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 S. 252.

对这份名单进行的一份社会学分析与研究，再度证明了类似的社会组合。^①

柏林的启蒙思想家有两个最重要的精英集团，一个是1749年成立的“星期一俱乐部”（Montags club），另一个是1783年秘密组成的“星期三协会”（Mittwochsgesellschaft）。在这两个集团成员身上，能清楚地看到这些启蒙思想家与政权、教会、学界的密切关系。

在政治上影响最大的是“星期三协会”，它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成员中有大量身居要职的普鲁士国家官员、政治家和神学家。例如，枢密院最高国务大臣冯·施特努恩斯（Von Struensee），枢密院最高法律大臣冯·施瓦勒茨（Von Svarez）及其助手恩斯特·斐迪南·克莱因（Ernst Ferdinand Klein），枢密院最高金融大臣冯·福勒默（Von Vlömer），枢密院成员、军事顾问、后出任国家公使的克里斯蒂安·威廉·多姆（Christian Wilhelm Dohm），以及新教最高教会理事会成员迪特里希·特勒尔、车尔勒、格迪克，王室图书馆馆员比斯特（格迪克与比斯特两人同时也是《柏林月刊》的编辑）等。哲学家门德尔松与恩格尔，神学家施帕尔丁和格柏哈尔德，王室御医迈尔和默森，著名出版商、时事评论家、历史学家和作家尼科莱以及其他柏林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这些人也都是“星期三协会”的成员。^②

对普鲁士启蒙运动的社会学分析还需要对它响应者的分析来进行补充。但是，要回答普鲁士启蒙主义公众的社会结构问题，却要比回答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出身问题困难得多。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启蒙运动在普鲁士并不涉及“一场广泛的

^① Horst Müller, *Aufklärung in Preusse*, S. 198.

^② *Ibid.*, S. 229.

群众运动”。从很大程度上讲，启蒙运动的思想作品尽管比它文学和哲学上的相反潮流要通俗得多，但它思想财富的接受者一般限于三个社会阶层的文化上层：即“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部分神学家及神职人员阶层，以及“受过教育的贵族阶层”。据尼科莱统计，“1776年在整个德意志，受过教育、有文化修养的人也就是2万人左右”，^①这里面还包括知识分子中的反对派。可见，启蒙公众当时在德意志社会并不具有普遍的群众性。

从当时主要的启蒙杂志的销售情况来看，只能反映出启蒙公众的大致规模。例如，《德意志图书馆汇编》在40年间共出版8万册，1777年达到过它最高的年出版数2548册，但只卖掉了2000册左右。克里斯多夫·马丁·维兰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主编的《德意志墨丘利》（*Teutschem Merkur*）1774至1796年间的年出版数由2000册下降到了1000册。在耶拿出版的《文学汇报》（*Allgemeinen Literatur-Zeitung*）1787年卖掉近2000册，在汉堡出版的《爱国者》（*Patriot*）同年达到过一次创纪录的销售——6000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August Ludwig Schlözer）从1782至1794年间在哥廷根主编过《国家的迹象》（*Statsanzeigen*），最辉煌的时期每年出版不过4000册。^②当然，不仅这些杂志彼此之间在展开竞争，而且除买者阅读外，还可能经多人之手。因此，要精确地得出启蒙公众的具体人数十分困难。

在18世纪，书籍的出版数量在不断上升，仅1791年，整个德意志就出版了3200种，但启蒙思想家的作品，连同古典主义作家的作

① Hans-Jürgen Fuhle und Hans-Ulrich Wehler. *Preußen im Rückblick*,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80, S. 183.

② Rauch Engelsing, *Analphabetentum und Lektüre. Zur Sozialgeschichte des Lesens zwischen Feudaler und industrieller Gesellschaft*, Stuttgart: Ernst Klett Verlag, 1973, S. 56.